

蒋介石“剿共”态度之研究(1932—1936)

——以处理“剿共”与平定粤桂关系为中心

郭昌文

[摘要] 1932年以后,蒋介石对“剿共”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的处理始终有着“清醒”认识,实难得出蒋有意纵共以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结论。“剿共”背景下蒋对西南的实际运作更多的是一种顺势而为。对于蒋方资料中貌似有纵共之嫌的言论,实不必作过多想象和发挥。对“剿共”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虽有“清醒”认识,并不必然表明蒋“剿共”态度坚决。在日本侵略的强大压力下,蒋对“剿共”有过动摇,但基本上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很快又重回“剿共”优先的轨道,念念不忘的还是非先安内不能攘外。至于所谓纵共讨好苏俄,以换回蒋经国,则是一些论者对蒋主观意图的大胆想象,并不符合蒋的处事逻辑。

[关键词] 蒋介石“剿共” 粤桂 地方实力派

一、引言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对“剿共”的态度与政策,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蒋“剿共”态度坚决,是“剿共”政策的坚决实施者。此种观点向为主流,国共两党的正统历史叙述均是如此。另一种认为蒋态度可疑,尤其是在1934年红军西撤时期,蒋有纵共之嫌。持此种观点者主要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认为蒋纵共以削弱异己,尤其是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西南地方实力派。最早持此种观点者是蒋在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早在宁粤对峙时期,“剿共”不力就是粤方责蒋的主要“罪证”。1934年10月,江西红军成功西撤后,胡汉民在海外用英、法两国文字发表《纵共政策及其危机》一文。不久,胡汉民操纵的《三民主义月刊》全文转载。在此文中,胡汉民历数蒋数年来之“剿赤”政策:“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其政策在藉剿赤为消灭异己部队之工具,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后则在藉剿赤以遮蔽其迁移日本投降之错误,并利用‘抗日必先剿共’之口号,谋保持国民

对彼之信任与谅解。同时仍实行其消灭异己之政策,希图树立其私人本位之嫡系武力。”其最主要的理由在于蒋高喊“剿共”,而“赤军之形势依旧”。^①胡汉民责蒋纵共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匪患依旧”,从逻辑上讲,这种从结果到原因的推论很难成立。实际上,胡氏责蒋纵共更多的是反蒋策略的需要,以及“西南——南京”对峙情形下对蒋动机的猜测与疑惧,缺乏有效证据。相较之下,曾担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军总司令部顾问的胡羽高在其《共匪西窜记》一文中所提出的纵共论,倒是罗列了大量证据。胡羽高借参与机密之便,收集了西南各省军政当局“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电文和材料,甚至游历各省、走访当局、听取战役经过及国民党军队将士言论,进而指出蒋有意纵共以达到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目的。胡羽高的研究为了解国民党军队尤其是地方实力派军队“追剿”红军保存了

^① 胡汉民:《纵共政策及其危机》,《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六期。

大量原始文电。不过胡羽高身在“地方”，代“地方”立言倾向十分明显，用以说明蒋意图的资料也多为来自地方实力派方面的文电和言论，难避偏信之嫌。^① 不管是胡汉民，还是胡羽高，二者责蒋纵共均具有政治意味。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第五次“围剿”前后出现的一些疑点，比如蒋对苏区封锁及进攻的部署，在红军积极准备撤离的关键阶段缺乏实施“围剿”的严密计划，蒋日记中一些模棱两可的表述等等，指出蒋纵共以对付两粤。^② 二是认为蒋纵共以讨好苏俄，以换回蒋经国，但论者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③

笔者以为，要探讨蒋的“剿共”态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尤其是蒋方的资料；二、进行正确解读，避免过度诠释。鉴于纵共的落脚点基本上聚焦于削弱地方实力派，因此，本文拟以1932—1936年对“剿共”与平定粤桂关系的处理为中心，来分析蒋的“剿共”态度问题。在时间上选择1932—1936年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在此之前，蒋对红军的发展尚未予以充分重视，视为地方事件处理，其“剿共”不力主要是认识上的偏差所致；1936年之后，国共和解，军事“剿共”实际已告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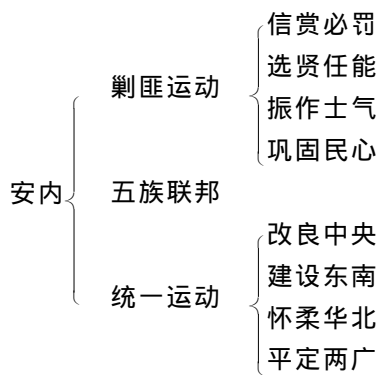
二、对平定粤桂建议的态度

蒋介石和粤桂实力派的矛盾由来已久。1927年处于宁汉对峙风口浪尖的蒋介石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逼迫而第一次下野，远赴日本，蒋桂自此结怨。虽然很快复职，但蒋余怒未消，私下（日记中）告诫自己：“白逆阳奉阴违，逆迹昭著，以后革命当先消除内部之叛逆也。”^④遂有1929年蒋桂战争发生，蒋藉实力优势、合理利用军事谋略，取得讨桂军事胜利，^⑤并欲乘此彻底解决桂系，迫令黄绍竑将李宗仁和白崇禧解送南京，李、白异常愤怒，认为“欺人太甚”。^⑥1930年中原大战蒋桂再度交锋，仍是蒋胜桂败，蒋视李、白下野为广西善后先决条件。^⑦不久，约法之争发生，粤桂连结形成联合反蒋之势。为了防止粤桂结合，蒋试图拉拢粤系陈济棠，但粤陈在古应芬等人的推动下，决心加入反蒋联盟。^⑧蒋也因粤桂强大压力，被迫二次下野。

1932年蒋介石复职再起后，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应付内外局势的基本原则。解决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是以统一为职志的蒋介石“安内”的重要

内容。“切思对外须先统一国内，即欲在下次世界大战中为一自由中立，或战斗员更须统一内部。余既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应该设法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统一。”^⑨在诸多地方实力派中，蒋视粤桂实力派与胡汉民等元老派结合而成的“西南”为统一主要障碍。因此，无论是从个人恩怨，还是从统一层面，就内心意愿而言，蒋均欲解决粤桂而后快，“急思统一广东。”^⑩

为了解决粤桂，蒋甚至有武力解决、大张挞伐的考虑与计划。1934年，蒋介石以图表形式制定了一份《救国方略》，分“安内”与“攘外”两部分。其“安内”部分如下：



显然，对华北实力派，蒋使用怀柔，对两广则要在“改良中央”和“建设东南”的基础上，准备武力解决。^⑪7月，蒋又制定了对粤计划的详细步骤：“甲、令余联络，乙、明令调免，丙、威胁激励，

①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贵阳羽高书店，1936年。

② 黄道炫的研究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参见黄道炫：《长征初期的蒋介石与粤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蒋介石的权力网络及其政治运作”学术会议论文。

③ 张戎不仅认为蒋介石有意纵共进入四川，以迫使地方实力派允许南京中央军队进入西南，而且指出蒋甚至有藉此以讨好苏俄，以换回蒋经国的意图。参见：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110—117页。

④ 蒋介石日记，1928年3月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以下所引不再标明收藏单位）。

⑤ 曾业英：《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⑥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49—450页。

⑦ 蒋介石日记，1931年1月27日。

⑧ 肖如平：《宁粤对峙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民国档案》2009年第2期。

⑨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31日。

⑩ 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日。

⑪ 转引自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作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丁、令何促成，戊、军事准备。”^①在日记中提醒自己，“粤非速征不可”。并于7月10日起，“以平粤计划与首都防御二者列入注意栏内，以为自检之地。”^②

宁方一些将领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求蒋先解决两广，再及其他。新桂系创始人之一，中原大战后离开桂系追随于蒋的黄绍竑较早有此建议。1933年初黄奉蒋命赴粤，要求广东出兵“担任剿共”任务，所得结果“很失望、很懊丧”。^③很可能是出于对粤方“剿共”态度不满，黄遂有“先收拾岭南”之建议。^④自称“股肱之列，凡有所见不敢不直陈”的刘峙在福建事变后电请蒋密定平粤计划，对基本部队“勿完全使用尽净”。其电称：

密。近日报载陈伯南扩编军队，购置飞机、潜艇不遗余力。虽名为剿匪，而其意固别有所在。兵强财足，隐然敌国，不无可虑。拟请钧座特密注意，不露声色，事先布置以资控置，而便将来之平定。至粤桂亲交，尤于中央不利，宜先设法分离之。职前到沪，张伯璇曾言桂对钧座近颇倾向，对粤恶感甚深，似此节亦非不能做到也。刻下能恪听指挥、堪作战者厥惟我基本各部队，其他皆阳奉阴违，决不可靠，乞随时严督整理，务使朝气常新，方可使用。并请对基本各部队予以更番休息整理，勿完全使用尽净，以免均致疲惫，一旦有事无以应付。全国统一现已具有基础，请更密定平乱计划，于各要点均先密为预备，以便进行。全国统一之大业，决非他人所能负。征诸各处舆论，国人之倚重于钧座者，至为殷切。职忝在股肱之列，凡有所见不敢不直陈，聊资赞助，乞察夺为禱。^⑤

刘峙是建议暗中准备，将来平定，对“剿共”所使用的基本部队“勿完全使用尽净。”深受蒋氏信任的陈诚则直接指出广东为“国防、剿匪两大决策之先决问题”，要求早日彻底解决：“广东一隅为国防、剿匪两大决策之先决问题，常此模棱两可，形成半独立之局势，国防、剿匪均被牵掣，似应乘此时机以较强之态促其听命，作进一步较彻底之解决以除患肘腋，后始克再言整军并剿匪也。”^⑥

蒋介石对粤桂虽有武力解决之意，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中，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无具体的军事行动，所运用者主要还是各种权谋，或联桂制粤，或

入湘制桂、入黔制桂，或对广东内部进行分化等等。之所以如此，除其他因素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在蒋看来，同粤桂实力派的寻衅杯葛相比，中共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正因为如此，即使1934年7月蒋对粤方极度不满，气得在日记中写下“粤非速征不可”时，又很快告诫自己：“政治解决广东，以武力为后盾。”^⑦对于下面将领收拾粤方的建议，蒋也反复提醒“剿共”为重。蒋对黄绍竑说：“为党国计，万不可乱此步骤。若此时急进，徒与共匪以良机，而岭南决无法收拾，兄等共为党国之罪人而已。故此时应力劝各方，合力剿匪，去其共同之害，方能成其各别之利。”^⑧黄绍竑毕竟不是蒋的亲信，蒋有可能不讲真话。但蒋对刘峙和陈诚的回复应该可以说明问题。蒋复刘峙电为：“目下心腹之病仍属匪患，吾人应并力急趋于此，倘匪能肃清，则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均可迎刃而解。”^⑨陈诚提出彻底解决广东时，红军已经西撤，因此，蒋强调的是追剿，“吾人当前最急之务，为湘边追击及赣南清剿，必须用其全力先完成此种任务”。^⑩

不难看出，虽然粤桂成为1932年以后蒋介石实施统一之梗，急欲解决而后快，甚至有武力解决的计划与准备，但在“剿共”与平定两广之间，优先的是前者。“合力剿匪，去其共同之害”，是蒋对粤桂的基本立场。这种先共后粤的取舍在蒋对粤桂参与“围剿”与“追剿”的态度中

① 《蒋中正档案》（以下简称《蒋档》）事略稿本，第26册，第498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34年7月7日、10日。

③ 黄绍竑：《五十回忆》，上海书店，1945年，第242页。

④ 《蒋档》事略稿本，第20册，第650页。

⑤ 《刘峙电蒋中正请予基本部队以更番休息整理密定平乱计划于各要点密为预备以便进行全国统一大业》，1934年2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150-088。

⑥ 《电呈委员长蒋中正以十八军久战残破请准积极整顿并对广东问题敬陈所见》，1934年11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文电甲类，典藏号：002-080200-00150-088。

⑦ 蒋介石日记，1934年7月13日。

⑧ 《蒋介石致黄绍竑电》（1933年6月25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0册，第650页。

⑨ 《蒋介石致刘峙电》（1934年3月1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5册，第4页。

⑩ 《蒋介石致陈诚电》（1934年11月12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8册，第442页。

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对拉粤“围剿”的重视

1932年复职再起,尤其是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剿共”成为蒋介石的兴奋中心。除了集结中央军主力、调整“剿共”方略外,蒋极力拉拢与红军活跃区域地缘相近的两粤参与“围剿”。身处江西“剿共”前线的熊式辉最早建议与粤方建立合作关系,以防“赤匪”：“长江交通如不能自由,最近将来赣省盐荒必甚,而赤匪或亦乘机益扰,故赣粤两省军事与交通应从速联络一气,以期互助。”^①蒋完全同意熊的建议,并指示联络步骤：“对粤省联络,请兄以私人名义通电或派员与伯南联络感情,然后再与之为在公务上进行合作。”^②先联络感情再谈公务合作,这几乎是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交涉时惯用手段。

随着红军在赣南、闽南的发展,通过熊式辉与陈济棠以私人名义联络的方式实际已无法满足“剿共”形势需要。1932年3月底红军以一部进向福建,试图攻取漳州、厦门海口,另一部进向赣江西岸,试图占领湘粤赣边区。为了遏制红军在赣南、闽南发展,蒋需要粤陈在“剿共”上担负更重要的责任。筹措粤陈的“剿共”款项以及给予何种名义,成为蒋思考的焦点,“本星期以…粤陈款项与剿匪名义为最急”。^③对于前者,蒋亲电宋子文要求尽力设法解决：“对于粤方协饷,除原拨三十万元外,增加二十万元,另拨桂方二十万元。中央每月共拨粤桂七十万元各节,兄可直电汪院长与中,中自当与之协商妥筹也。”^④对于后者,蒋于4月19日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为了笼络粤陈,蒋甚至勉励自己要仿效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之举,“余实不忍遽弃伯南,先使伯南形式上不再叛变,然后徐徐使其心服也。呜呼,诸葛武侯之平南人七擒七纵,以服其心,使不敢复萌异志,然后方讨汉贼,报国仇,此其用心可深长思焉。”^⑤

对十九路军赴闽态度的变化颇能说明蒋拉粤“围剿”的良苦用心。淞沪战事渐趋稳定后,蒋拟调十九路军赴闽“剿共”。但当蒋认为陈铭枢“急求率第十九路军赴闽”,以图报复粤陈撤去张惠常空军总司令职务时,颇为担心由此引起广东内部冲突,导致粤陈“调赣南部队亦必回粤,”“有碍中央剿匪计划,”而迟迟“未肯下令”。为了避免此种局面的出现,蒋先是命罗卓英前往赣南拜会余汉

谋,“最好留余部在赣南完成剿匪使命。”又担心余“直辖于伯南,如我方往留则于公私皆有为难。”蒋又建议何应钦设法从中疏通,“如兄能电约伯南在赣南一晤更好,否则以慰劳余军名义赴赣南一晤幄奇亦好,但须先与伯南说明,作事宜周到为妙。”^⑥

福建事变后,为进一步推进第五次“围剿”以及防止红军西撤,蒋加强了拉粤工作。1934年初藉平定福建事变之机,中央军得以进入闽南,并设置东路军“剿匪”总司令部,以蒋鼎文为总司令。在东、北两路均布置中央军重兵的情况下,蒋认为南路“剿共”事关全局,“以后肃清赣匪之关键与迟速成败,皆在该路部队之得力与否耳。”为使宁粤行动一致,蒋决定派蒋鼎文赴粤与陈济棠面洽。2月10日,蒋致电蒋鼎文：“最好兄先赴粤一行,与伯南面商进剿闽西与赣南赤匪办法,决定一切计划,俾得共同一致。”为使蒋鼎文赴粤之行有所收获,蒋为其作了精心准备：

其一、关于合作“围剿”的具体方案。蒋指出：“所有计划,由其先提,再来电呈核。我方不必有方案,如其能担任由龙岩入汀州占瑞金更好,否则我方亦可担任。”^⑦不久,粤军联络参谋涂维藩将粤方所拟计划电蒋,其计划为：“一、中央军解放龙岩、马子凹之线；二、先肃清赣西孔、萧残股,然后第一纵队即余汉谋军推进会(昌)、于(都)与兴国之线。三、第二纵队随第一纵队同时推进；四、先将孔、萧残部压迫于遂川,或其以南地区,并堵截于万泰、永宁、莲花,以防其溃窜。同时,令第一纵队进军遂川聚而歼之。五、会、于并无大股匪,惟收复易而善后难；六、孔、萧残匪不肃清,虽进入会、于而后侧背感受威胁,难办善后。”得悉粤方计划后,蒋通知蒋鼎文与粤方所谈底线：“如与伯南

① 《熊式辉致蒋介石电》(1932年1月31日),《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22页。

② 《蒋介石致熊式辉电》(1932年2月1日),《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22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10日。

④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2年4月15日),《蒋档》事略稿本,第14册,第84页。

⑤ 《蒋档》事略稿本,第14册,第236页。

⑥ 《蒋介石致何应钦、陈诚电》(1932年5月12日),《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2年5月16日),《蒋档》事略稿本,第14册,第283—284页、328—329页。

⑦ 《蒋介石致蒋鼎文电》(1934年2月10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4册,第380页。

相谈,倘能龙岩、汀州、瑞金要中央担任进剿,则会昌、于都与兴国三县,必须由粤军负责进剿,并请其规定各期进度之地区与时日、兵力、部队、番号,列成方案,俾可照此方案,彼此遵守实行也。但须于本年五月以前进至瑞金、会昌、于都之线”。^①从蒋对蒋鼎文的指示来看,蒋对粤方参与“围剿”有这样几个特征:一、合作“围剿”,这是原则;二、粤方自定计划,自选“进剿”线路,这是优待;三、计划要具体,进度、时日、兵力、部队、番号,都要列成方案,避免空洞,这是要求。

其二、态度谦恭。“兄如到粤,对伯南需谦和,并可声明东南两路地区虽分,而进剿任务如一,并受伯南指挥之意言之,则彼此更可团结也。”^②陈济棠为南路军“剿匪”军总司令,蒋鼎文为东路军“剿匪”军总司令,二者本无隶属关系,蒋却要蒋鼎文“受伯南指挥”,拉拢粤陈之意十分明显。

其三、给予实利。福建事变后新成立的省府中,蒋拟以财政厅长一职赋予与粤陈关系密切的粤方人士孙家哲,以使“中央与粤日臻团结”、“以为双方互助之基”。^③而蒋鼎文为新成立的闽府绥靖主任,蒋令其“电伯南催孙家哲来闽就职,以示好意”,是蒋为蒋鼎文赴粤见陈准备的厚礼。^④

与此同时,在粤方所关注的对日政策上,蒋格外谨慎,避免刺激粤陈,致使其撤去赣南“围剿”之兵。1934年5月,在华北负责对日交涉的黄郛与日本达成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协定,通车日期定于7月1日。对于通车、通邮问题,在日本一再逼迫下,蒋在原则上已经同意,并要求中央政治会议早日决定具体方案:“华北停战,瞬届一年,以通邮、通车问题不决,致撤兵迁延,交通梗塞,始终保持战时之状态,不特战区善后要政,无从进行,而社会不安,人心不定,尤足深虑。”“通车问题我国独当其冲,自属无可避免,且敌焰因此益张,与其坐待强迫,不可收拾而后为之,不如即速自定方针,自动主办之为愈。”^⑤但黄郛与日方所达成的通车时间却让蒋倍感担忧,要求黄尽力设法展缓通车日期,“能展至八九月间为宜,恐太早则汀州与瑞金未占时,粤军借故撤兵,致兹功亏一篑,不无可虑耳。”^⑥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有承认伪满洲国之嫌,粤方可能借此寻衅杯葛,蒋担心因此影响“剿共”。虽然通车日期并未因此而展缓,其过

程却透视出蒋的忧思所在。

四、对粤桂“追剿”态度的演变

尽管蒋介石为防范红军西撤,对粤陈尽力拉拢,并早在1934年5月要求陈济棠、何键修筑碉堡工事,“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先待第一线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线,总期于此两个月内,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希望以此达到“一劳永逸”之目的。^⑦但红军仍于10月借道陈济棠部所控制的安远、信丰地区成功突围。自此国共军事对决由“围剿—反围剿”切换成“追堵—长征”模式。蒋对粤桂“追剿”态度的演变也颇能说明先共后粤的“安内”原则。

蒋介石是在10月底获悉红军突围消息,并得到陈济棠部让开防区的情报,大为震惊,以“何以对天下与后世”“大义”责问粤陈:“赣南匪部安全西窜,而南路军只留一团兵力守赣州,其余撤至大余以西,任令匪部由赣州之大余空隙间偷窜。平时请饷请械,要求倍至,当此残匪肃清关头,竟不能为国家民族稍加努力,以尽职守,其将何以对天下与后世?”^⑧并准备停发粤桂“协剿费”以为制裁:对广东,“每月协剿费四十万元,本月份已付几何,未付之款,可暂欠缓付”;^⑨对广西,在10月2

① 《蒋介石致蒋鼎文电》(1934年2月14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4册,第425—426页。

② 《蒋介石致蒋鼎文电》(1934年2月20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4册,第438—439页。

③ 《蒋介石致杨永泰电》(1934年1月1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4册,第145—146页。

④ 《蒋介石致陈仪、蒋鼎文电》(1934年2月10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4册,第380页。

⑤ 《蒋介石呈中央政治会议订华北通邮通车方针电》(1934年5月2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97页。

⑥ 《蒋介石致黄郛电》(1934年5月24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6册,第168页。

⑦ 《蒋介石致陈济棠、何键电》(1934年5月18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6册,第133—134页。

⑧ 《蒋介石致蒋伯诚电》(1934年10月31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8册,第385—386页。

⑨ 《蒋中正电周骏彦广东本月协剿费已付几何未付可暂欠缓付》(1934年10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典藏号:002-010200-000121-062。

日时,蒋还准备“发桂补助费”,^①此时则电告何应钦“对于德邻要款之电,暂可不复。”^②但蒋深知,为防止红军经由黔东北上四川,打通西北国际交通线,最好还是在湘江以东,至少应当在湘西、黔东交界地区将其歼灭。^③因此,蒋仍须粤桂合作进行堵剿,“事势至此,亡羊补牢之法,只有运其全力,务期歼匪于湘江以东地区。”希望粤陈“速以主力急进汝城与郴州之线,与湘军及赣中追击部队协力进行之,勿使匪部再向西窜。失此不图,必貽党国大患。”^④又通过蒋伯诚向粤陈进行安抚:“伯南兄已往环境困难,精神困苦,中均十分谅解。在追剿期中及剿匪告一段落后,均盼其始终切实负责,共维大局。中央所以依畀者,绝不因赣匪西窜而有所变更。”^⑤

虽经努力,蒋在湘境消灭红军企图也未得逞。红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强渡湘江,并经湘黔边境进入贵州。随着红军西撤入黔,中央军也尾随进入,藉控黔局而镇西南。指挥中央军“追剿”的薛岳电蒋表示:“本路军今次入黔,责在剿匪,间接亦为中央对西南政治设施之监视者。……而西南政治故障,方期迎刃以解也。”蒋本有此意,得薛岳电后即复“所见甚是,当令筹备。”^⑥在粤桂看来,中央军入黔是“驱共入两粤以计不得逞”的后着,目的是“军事长期包围”,^⑦在包围圈的东面,“因中央以种种关系,决不敢对粤用兵,故闽赣湘边不足顾虑。”^⑧因此,掌控黔桂边境对于粤桂安全异常重要。为此,粤桂为进入黔境制定了三个方案:“一、如中央军全力追剿共匪,彼即攫取黔政;二、如中央军以少数兵力留守,则当乘机解决;三、如中央军全部驻黔,则向地方宣传,中央剿共不诚。”^⑨蒋则根据“剿共”形势的急缓而对粤桂入黔“追剿”采取不同态度。

1934年12月14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整编部队全力进向贵州。25日,占镇远。26日占施秉、黄平。28日,占余庆、瓮安,向息烽急进。1935年1月5日,红军攻占遵义。红军在黔东、黔北接连闯关、高歌猛进,使蒋不敢大意,因而认可粤桂军入黔“追剿”。1934年12月27日,蒋对蒋伯诚表示:“两粤出兵追剿,中始终赞成,并望伯南兄断然行之。”^⑩只是希望粤桂出兵名义由南京方面发表,“至于德邻名义,可请其自酌定,由中央发表,但不能再用西南政会名义同受委任,否则无须再请中央发表也。”^⑪蒋甚至一度准备以湘系将

领刘兴代理贵州绥靖主任,与粤桂关系密切的张发奎接卫立煌任“赣闽皖浙边区各军清剿散匪”,以和缓粤桂。^⑫

随着黔东失地,尤其是被蒋视为克复后即可判断红军趋向的遵义的收复^⑬,使蒋认为黔省“剿共”形势已在掌控之中,转而对粤桂军入黔态度发生转变。1935年1月31日,蒋致电薛岳:“黔北之匪,不日即可肃清,则粤桂军不必入黔。中已转商伯南,而兄亦可向桂婉劝,其在都匀等部队,不必再行北进。”^⑭并任命薛为贵州绥靖主任。粤桂即以“共匪窜黔入川,志在据险顽抗,徐图发展,北进则打通甘新取得第三国际联络,南向则蚕食滇桂、扰乱缅越各地治安,其危害我国民族,破坏远东和平之严重性实百倍于

① 蒋介石日记,1934年10月2日。

②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4年11月6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8册,第417页。

③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4—306页。

④ 《蒋介石致杨德昭、蒋伯诚电》(1934年11月5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8册,第413—414页。

⑤ 《蒋介石致蒋伯诚电》(1934年11月19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8册,第476页。

⑥ 《薛岳致蒋介石电》,《蒋介石复薛岳电》(1934年12月31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8册,第684页。

⑦ 《陈其尤电蒋中正李济深昨来港见胡汉民并嘲讽中央欲驱共入两粤失败改取军事长期包围及共匪入黔迫贵州烟土经桂故吾桂返资获益等》(1935年1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199-168。

⑧ 《蒋伯诚电蒋中正对黔事处置建议调王家烈离黔入川另派黔绥靖主任封锁烟土入桂并派员驻滇联络暂不理桂则不久自崩溃矣》(1935年2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205-106。

⑨ 《贺衷寒等电蒋中正此次粤桂军要求援黔意在趁中央军追剿共军时攫取黔政及如中央军全部驻黔则向地方宣传中央剿共不诚龙云虽不为粤桂所动惟仍不放弃其主张等文电日报表》(1935年2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61-062。

⑩ 《蒋介石致蒋伯诚电》(1934年12月27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8册,第642页。

⑪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4年12月25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8册,第632页。

⑫ 《蒋中正拟任刘兴代理贵州绥靖主任张发奎指挥赣闽皖浙边区清剿残匪》(1935年1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筹笔(统一时期),典藏号:002-010200-00126-015。

⑬ 《蒋介石致薛岳电》(1935年1月13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9册,第77—78页。

⑭ 《蒋介石致薛岳电》(1935年1月31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9册,第190—191页。

昔日偏出江西之匪。赣共经数十万大军四面包围,尚能支持数载,从容率众西窜,川共则既有险可恃,而川省赤化条件亦较赣为具备,且更有受得第三国际联络之可能。若不趁其喘息未定而彻底剿除,则异日贻害无穷。……共匪问题扩而言之非中国一国之问题,乃国际问题也,简而言之,亦非三数人之利害问题,乃我民族之存亡问题也”为由,声称“职等以追剿为请,志在歼共,非谓共匪越过黔省即与职等无关,可以置之不问。”^①蒋深知粤桂意图所在,毫不让步,“粤桂军追剿及德邻名义问题,以朱毛残匪最近可于横江以东地区悉数歼灭。川中士气转旺,所余川北徐匪,川军独运全力亦可了之。故粤桂军入川追剿,远水莫济,时机已过,不特非川人之所急需,且恐因此而反生其误解。”^②

2月下旬,红军经黔川边境北上受挫,回师黔北,予王家烈的黔军以及中央军吴奇伟部以沉重打击,黔省“剿共”又成紧张之局。蒋对粤桂军入黔态度出现转机,“令其参加进剿”。^③3月10日,蒋致电白崇禧,通报“剿共”进展,希望粤桂共同努力,一致进行:“近日匪情,其大部于鱼日已向黔西方面窜去,思达其原定西窜之目的。后因我周部与滇军孙部在黔西与仁怀一带堵截,乃又回窜遵城、鸭溪附近。此匪已成釜底游魂,如其果盘踞遵城,不难一网打尽,正为我歼匪良机。尚望兄等共同努力,一致进行,完成使命,对于进剿意见,请兄等筹精详告,斯得至当。”^④并下令解决令粤方不满的欠款、飞机护照等问题,“对粤欠款已令分期发还,飞机护照再电航会照发勿误,粤军驻桂部队中意不必急调回粤。”^⑤4月2日,蒋要求桂军廖磊部“开抵马场坪一带候令。”^⑥4日,又要求桂军“鱼日以前推进平越牛场一带,以便对东窜之匪扼要堵剿。”对于粤军,“张达部队现在相距甚远,一时不能使用,俟匪窜向明了,有必要时,再行电商伯南。”^⑦

五、余论

1932年以后,粤桂实力派与胡汉民等元老派结合而成“西南”,成为蒋介石推进统一进程的主要障碍。蒋虽急思解决,甚至有武力平定的计划与准备,却忍而未发,中共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完成军事“剿共”,在江西“围剿”时期,千方百计拉粤“围剿”;在“追剿”过程中,视“剿共”形势变化而异,贯穿始终的是

“先共后粤”原则。虽然1936年蒋利用胡汉民逝世之机,在“剿共”仍在进行之际,完成了两广中央化进程,却也并未背离这一原则,因为在蒋看来,“剿共”“已达到七分成功”。^⑧可以说,在解决粤桂与军事“剿共”的选择中,蒋始终有着“清醒”认识。正是由于这种“清醒”,即使在内心深处,蒋对粤桂有再多的心机和算计,在具体的执行层面中仍是先共后粤。

或许有人会说粤桂实力派有其特殊性,背后有象征着国民党党统的胡汉民等元老派的支持,使蒋不敢轻举妄动,因此蒋对粤桂实力派的处理并不意味着他对所有实力派均会如此。对此问题,蒋对“剿共”前线将领薛岳建议地方实力派和红军互斗以收渔利的答复应该可以给出明确答案:“军阀、土匪如任其自杀,必有一伤,且必为军阀惨败无疑,结果徒增大匪势,恐中央亦无力收拾矣。”^⑨正是出于对“匪势”增大的顾忌,决定了在具体执行层面中蒋处理“剿共”与解决地方实力派关系的实际逻辑。蒋对先“剿共”后地方实力派原则的“清醒”认识,党的利益无疑起着重要作用。正如蒋所坦诚,“对党内可以让步,对党外反动绝

^① 《吴忠信熊式辉陈济棠等电蒋中正中央与西南接洽情形及广东广西军人入贵州剿匪经过等西南问题处理情况》,《陈济棠、李宗仁致蒋中正电》(1935年2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粤桂政潮,典藏号:002-080101-00034-003。

^② 《蒋介石致蒋伯诚电》(1935年2月13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9册,第355页。

^③ 《蒋档》事略稿本,第30册,第73页。

^④ 《蒋介石致白崇禧电》(1935年3月10日),《蒋档》事略稿本,第30册,第73-74页。

^⑤ 《蒋中正电示蒋伯诚驻黔各军应归统一指挥等事》(1935年3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筹笔(统一时期),典藏号:002-010200-00129-061。

^⑥ 《蒋介石致白崇禧、廖磊电》《蒋介石致张伯璇、刘为章电》(1935年4月2日),《蒋档》事略稿本,第30册,第307页。

^⑦ 《蒋介石致白崇禧电》(1935年4月4日),《蒋档》事略稿本,第30册,第333页。

^⑧ 蒋介石在1935年12月31日反省录中记:“本年驱逐毛泽东主匪于川滇之外,使西南不受其害,川中朱、徐残匪虽尚未肃清,然已封锁于川康大金川不毛之地,不使其窜扰于远,而鄂西萧、贺亦不能负隅老巢,穷窜湘西黔东,此皆剿匪胜利之特点也。至陕北之匪,虽猖獗未杀,此乃东北军不行之故,决非赤匪之强也。总之,今年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已达到七分成功。”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困勉记,典藏号:002-060200-00004-010。

^⑨ 《蒋介石致薛岳电》(1935年2月10日),《蒋档》事略稿本,第29册,第309页。

不姑息。”^①

从处理“剿共”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来看,实难得出蒋有意纵共以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结论,“剿共”背景下蒋对西南的实际运作更多的是一种顺势而为。而有趣的是,蒋本人在其日记中的某些记载又为一些论者的大胆猜想提供了空间,成为论证蒋纵共的证据。比如,蒋在10月底得知红军西撤后,在月反省录中记:“本月经过:甲、兴国、宁都、石城完全克复;乙、遍历甘宁陕豫冀鲁各省;丙、匪向西窜;丁、大会展期;戊、本身健康,检验无恙;己、晋鲁军调赣;庚、川事渐稳;辛、新疆通车。此皆统一之佳音也。”^②再比如,1934年11月底,何其巩向蒋建议对红军“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而蒋称之为“颇中肯綮,足备参考”。^③1934年底,展望新年形势时,蒋设想“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也。当再熟筹之。”^④对于这些貌似有纵共之嫌的言论,实不必作过多想象和发挥。本来蒋就视长期活跃于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的红军为心腹之患。红军西撤,既意味着巩固所谓核心区域的努力终有所成,也意味着在处理地方实力派的问题上更具底气和从容。因而可以看到红军西撤之后,蒋在私下里(日记中)对地方实力派尤其是西南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至于红军西撤后,对西南问题的种种设想与计划,也完全是蒋对既有形势的逻辑运用。实际上,即使是这种逻辑运用与顺势而为也并未即刻成为定策,毕竟在机遇面前蒋一度还徘徊于“先收西南放任中央”与“整理中央放任西南”二策之间。^⑤

对“剿共”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虽有清醒认识,也不并必然表明蒋“剿共”态度坚决,因为日本因素的存在使蒋不敢掉以轻心。从现有材料来看,蒋至少有过两次游移。一次是在1932年淞沪战事期间,蒋致电主持江西“剿共”的熊式辉、朱绍良,声称“如果局势紧张或不能不放弃剿匪计划,亦未可知。”^⑥另一次是在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蒋在考虑“剿共”与对日“必舍其一而专对其一”时,一度打算“以对倭为先”。^⑦显然,在日本侵略的强大压力下,蒋对“剿共”有过动摇,但基本上只是一闪而过的念

头,蒋很快又重回“剿共”优先的轨道,念念不忘的还是非先安内不能攘外。

至于所谓蒋纵共以讨好苏俄,以换回蒋经国,则是一些论者对蒋主观意图的大胆想象,并不符合蒋的处事逻辑。毕竟1931年当宋庆龄建议释放牛兰夫妇以遣返蒋经国时,蒋都坚决回绝,“余宁使经儿不还,或任被苏俄残杀,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而换我亲子也。”^⑧何况是以牺牲整个“剿共”前途为代价。

(文中所用蒋介石日记承蒙陈红民教授、刘大禹博士提供,谨表谢意!)

[郭昌文: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邮编:310028]
[责任编辑:臧如高]

① 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29日。

② 《蒋档》事略稿本,第28册,第378页。

③ 《蒋档》事略稿本,第28册,第508—513页。

④ 蒋介石日记,1934年12月29日。

⑤ 蒋介石日记,1934年10月29日。

⑥ 《蒋介石致电朱绍良、熊式辉》(1932年2月8日),《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22—223页。

⑦ 《蒋档》事略稿本,第18册,第136—137页。

⑧ 《蒋档》事略稿本,第12册,第464—465页。